

乡土文化对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认同度的影响及破解路径

王有龙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2月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7日

摘要

在人口老龄化持续加重的背景下, 新型互助养老模式成为破解农村家庭照护功能不足的重要方式之一。乡土文化作为乡村社会的精神支柱, 影响着老年人对该模式的接纳。本文基于乡土文化理论、社会认同理论与互助养老等相关理论, 剖析乡土文化对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认同度的双重作用, 以乡土社会的信任网络、守望相助的传统与孝道伦理为互助养老提供天然文化根基与社会基础, 但是由于传统“养儿防老”观念的路径依赖、乡土社会变迁引发的信任弱化以及代际文化认知差异及部分地区利己倾向凸显等因素, 不利于认同度的提升。本研究结合农村互助养老现实困境, 试图从文化传承创新、模式适配优化、政策协同保障、人才培养支撑四个维度, 提出针对性方法, 从而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落地成效、构建契合乡土社会的养老服务体系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

乡土文化, 农村互助养老, 认同度, 影响机制, 破解路径

The Influence of Local Culture on the Acceptance of Rural Mutual Aid Pension Model and Its Solutions

Youlong W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February 2, 2026; accepted: April 14, 2026; published: April 27, 2026

Abstract

In the social context of deepening population aging, the new mutual elderly care model has become

a pivotal approach to tackling the predicament of weakened family care functions in rural areas. As the spiritual core of rural society, rural local culture exert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elderly residents' cognition of, emotional acceptance of, and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is mode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ural local cultur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relevant theories of mutual elderly car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dual impacts of rural local culture o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rural mutual elderly care model. On the one hand, the trust network, the traditional norm of neighborly mutual aid and the ethics of filial piety in rural society provide an inherent cultural foundation and social underpinning for mutual elderly care; on the other hand, the improvement of such recognition is constrained by factors including the path dependence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raising sons to support one's old age", eroded social trust arising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ociety, intergenerational disparities in cultural cognition, and the growing prevalence of self-interest tendencies in some rural areas. In light of the practical predicaments of rural mutual elderly care, this paper proposes targeted strategies from four dimensions: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model adaptation and optimization, coordinated policy safeguards, and talent cultivation and support. The research findings aim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enhancing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of the rural mutual elderly care model, constructing an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compatible with rural society, and advanc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active aging strategy.

Keywords

Local Culture, Rural Mutual Aid Pension, Acceptance, Influence Mechanism, Solution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当前中国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挑战之一，根据中国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0岁以上人口显著高于城镇，而在2025年人口老龄化比例是25%，银发浪潮由此将对我国农村养老体系产生严重的冲击。而传统的养老模式因为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家庭规模原子化，而导致持续的弱化。同时养老机构受限于农村，地理条件、资源不足等现实条件，难以全面覆盖，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凭借其低成本、广覆盖、本土化的特征，成为衔接家庭和社会养老的重要桥梁[1]。

乡土文化作为我国传统社会中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文化，其带有尊老爱幼、熟人社会和乡土守望等特征，这是维系我国乡村社会和社会秩序的重要精神纽带之一。乡村中的老年人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判断，深深地融入于乡村文化的语境之中，这必然会影响到新型养老模式的推广。在我国部分乡村地区，拥有浓厚的乡土互助文化，这推动构建了村集体主导加邻里互助的养老模式，但同时一些地区则由于传统观念的存在，信任不足等因素，不利于互助养老模式的推广，目前现有的研究多聚焦于互助养老模式的制度设计和运行困境，而对于乡土文化和该模式认同度之间的关联性缺乏研究，尤其是对文化的双重影响机制，分析不足，解决方法的针对性也不甚强，所以本研究认为通过深入探究乡土文化对于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理论方面，笔者在研究中将运用乡土文化理论、社会认同理论以及养老互助等相关研究，从而揭示我国传统文化因素对于养老模式的影响机制是怎样的一个逻辑，并且丰富乡土文化和养老服务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更进一步完善农村养老互助模式的理论体系，而在实践层面，本研究试图精准识别制约

农村互助养老认同的文化障碍，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从而为地方政府制定养老政策、提升互助养老模式的推广提供一定的参考，有利于缓解农村的养老压力，帮助全社会实现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民生目标。

本研究以“文化影响-现实困境-路径破解”为文章主线，首先，分析乡土文化对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认同度的正向促进与负向制约作用，其次，结合当前农村互助养老认同度现状与文化层面的核心困境，最终，从文化、模式、政策、人才四个维度提出破解路径，并为构建契合乡土社会的农村互助养老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2. 乡土文化对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认同度的双重影响

乡土文化对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具有正面和负面作用。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就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揭示了乡土社会中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圈层结构特征[2]。本研究将这两个理论视角相结合，从而希望能够系统论述乡土文化如何通过影响老年人身份认同与社会比较，分析影响其对互助养老模式的认知。

2.1. 乡土文化对互助养老认同的正向促进作用

第一，熟人社会为互助养老的推行提供了一定认识上的基础，从而降低信任成本。在农村社会中，老年人长期生活于村庄之内，邻里之间不仅相互熟识，而且长期生活和生产在一起。这种基于乡土关系的共同体使老年人很容易在心里将邻里归入我们群体，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句俗语：远亲不如近邻。同时社会认同理论指出，个体对群体成员天然具有更高的信任度与包容性。正是这一信任机制可以帮助化解了互助养老服务中的顾虑风险，老年人无需担忧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或能力不足，他们往往被老年人视作自己人。在江西、浙江等地的一些农村，通过依托熟人网络组建的邻里互助小组，提供高龄老人所需要的日常照料[3]，高龄老人则以生活经验回馈，研究表明互助模式参与率显著高于陌生人的社会环境。

其次，守望相助的传统可以内化为农村老年人的群体认同，并且与互助养老理念向契合。个体可以凭借认同群体规范与价值来获得归属感与自我价值。我国农村社会在长期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传统，这构成了我国乡土文化的重要价值内核之一。这一传统使农村老年人对互帮互助理念相对容易去接纳，参与互助不仅是获得服务，同时也是对一种身份认同的践行。当互助养老模式将这一传统制度化、常态化时，它实际上为老年人提供了一种延续其群体认同的途径。以云南部分农村的田园综合体养老模式为例，老年人通过集体劳作、邻里帮扶等形式参与互助，这一模式既延续了传统习惯，又在其中强化了村庄内部群体认同，从而获得归属感与心理满足[4]。

第三，孝道伦理与面子机制共同构成社会比较的评价标准强化了互助养老的社会合法性。在乡土社会中孝亲敬老不仅是家庭伦理，也是村庄公共评价的重要标准之一。个体会通过与他人比较来提升自我评价或群体地位。而在孝道文化的影响下，参与互助养老可以被老年人视为敬老爱老的体现，帮助他人可以获得善人、有德的评价，同时接受帮助也通过子女的支持或邻里的关怀来维系家庭和睦。正向激励使得互助行为不仅获得村庄社会的认可，更可以成为老年人维持自尊与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之一。参与互助能够积累面子，进一步强化了老年人对互助模式的认同与参与意愿。

2.2. 乡土文化对互助养老负向制约作用

第一，养儿防老观念是我国乡村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之一，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一观念容易与互助养老产生认同冲突。在传统乡土文化中，养儿防老可以说是唯一的养老方式，而互助养老将会冲击老年人对有尊严的晚年这一身份认同的核心构成。社会认同理论指出，当新事物与个体旧有身份认同发生

冲突时，个体会产生心理抵触甚至排斥。对农村老年人而言，依赖子女养老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而接受邻里或集体的互助服务，则可能被视为子女不孝或自身无依的象征，这与他们对我是有儿女的人、我的晚年是体面的这一身份认同形成认知上冲突。即使家庭照护能力已然弱化，老年人可能会担心被熟人议论子女不孝或老来无靠，而对互助养老模式产生心理抵触。这正是养儿防老观念作为身份认同核心要素，对新型养老模式产生的排斥效应[5]。

第二，乡土社会变迁导致乡土社会信任基础被削弱。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熟人社会逐渐向半熟人社会转型。而社会认同理论中的类化过程依赖于清晰的群体边界和持续的互动经验，而人口流动恰恰打破了这一条件，人口大量流失，自己人网络因成员外流而残缺。与此同时，现代文化冲击导致部分农村地区个体主义倾向凸显。这种边界的模糊与群体认同的弱化，使得老年人难以再对邻里形成自己人的信任判断。当互助养老模式的运行依赖互惠逻辑时，信任的弱化直接导致老年人产生付出无回报或接受服务后无法回馈的顾虑，从而降低参与意愿。

第三，代际文化差异加剧认同分化。社会比较不仅发生在同辈之间也存在于代际之间。年轻群体受到现代养老观念影响，更易接受互助养老、智慧养老等新型模式，而老年群体则因为对于乡土文化的传统认知。这种认识的不同导致家庭内部对互助养老的态度出现差异，子女可能支持父母参与互助，但老年人可能会将子女的支持解读为不愿赡养父母，从而产生被抛弃感。这种认知进一步强化了老年人对互助养老的排斥。

第四，面子机制转化为负向社会比较不利于老年群体的参与。在熟人社会中，面子作为社会评价标尺之一，社会认同理论中的社会比较过程在此呈现为负面效应。部分老年人担心接受他人帮助会被同村人视为年老无用、生活困顿，从而在村庄中处于劣势地位。这种恐惧使得他们宁愿独自承担生活困难，也不愿作为服务接受者参与互助。

3.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认同度现状与文化层面的困境

3.1.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认同度现状

现有的数据显示，中国老年人群体对于互助养老模式的认知度不足一半，而愿意主动参与的比例仅为百分之 30~40 左右，明显低于城市社区水平[6]，根据某社区的调研。城市老年人时间银行型互助养老模式，参与意愿接近 50%。而农村地区的参与意愿则普遍低于这一水平。虽然部分农村老人知晓这一互助养老模式，也因为各种顾虑而不愿意参加，其原因如下。

首先对于互助养老模式的认知度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并且受乡土文化的影响十分显著。在我国一些经济发达的农村，宗族文化浓厚、青壮年人口外流较少的地区对于互助养老模式的认同度较高。例如，在我国，江西，浙江等部分的农村地区，依托村集体主导和村组织。文化对于互助养老模式参与率较高。而在一些青壮年人群外流严重，乡土文化传承断裂的农村地区，认同度普遍较低，互助养老模式，难以推广。这种差异明显体现了乡村文化对于模式认同的深刻影响。在文化传承较好的地区，互助养老模式更容易获得老年人的接纳和认可。

老年人群体对于互助养老模式的认知存在某种偏差，这进一步地制约了该模式的发展。部分老年人群体将互助养老等同于政府提供的免费服务，对于模式的运行缺乏基本的了解，认为参与互助养老就是占便宜或者添麻烦，还有老年人对于其质量安全性存在顾虑，担心邻里提供的照料服务不够专业，无法满足健康需求，认知偏差，导致老年人即便有意愿参与其中，也会因为误解而犹豫观望，难以形成稳定的参与。

3.2. 文化层面的核心困境

第一，目前乡土文化传承断裂导致互助养老缺乏文化氛围支撑。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引发“空心

化”问题，使得乡土文化的传承主体缺失，目前大量年轻群体长期脱离农村生活，对传统互助文化、孝道文化的认同度降低，而老年群体的文化传承能力有限，导致守望相助等传统精神逐渐淡化[7]。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现代文化冲击，不断瓦解着传统社会的文化根基，部分农村地区出现邻里关系疏远、互助意识弱化的现象，并且互助养老模式缺乏必要的文化氛围支撑，难以获得老年人的广泛认同。

同时，互助养老模式设计与乡土文化适配性不足难以满足符合老年人的需求与习惯。现有模式多照搬城市经验，忽视了乡土社会的特殊性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例如，部分地区机械引入城市时间银行模式，采用复杂的服务时间记录与兑换机制，实际上不符合农村老年人的认知水平与生活习惯，部分互助养老服务内容往往聚焦于城市老年人关注的文化娱乐、康复护理等需求，但是忽视了农村老年人对助农、代购等核心需求，还有部分模式采用陌生人服务的形式，这一形式违背了农村熟人社会的信任逻辑导致老年人难以接纳[8]。

第三，政策宣传与文化引导脱节无法有效化解传统观念抵触。例如，在政策推广的过程中，现有政策宣传多侧重模式功能与政策优惠的介绍，缺乏对乡土文化与互助养老契合点的挖掘与宣传。政策宣传方式多采用公告、传单等形式，不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难以有效传递模式价值。其次，宣传内容未能回应老年人顾虑，没有将互助养老与孝道文化、互助传统有机结合，可能会导致部分老年人对模式存在认知上的偏差，这不利于形成情感认同。

熟人社会的信任网络是互助养老的重要基础，但是随着社会变迁，这一网络逐渐弱化，同时新型信任机制尚未建立。目前农村互助养老组织普遍缺乏规范的运营规则与监管机制，存在服务质量、责任划分不明确等问题，导致老年人对互助服务的安全性、可靠性存在顾虑，这一点也是难免的。

4. 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认同度的破解路径

笔者认为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认同度的关键在于将抽象的文化引导转化为具体而微的乡土实践。近年来，河北肥乡、山西长子、浙江东阳等地的创新探索表明，通过村规民约的精细化设计、量化管理以及仪式化表彰，确立了孝道评价标准从而破解养儿防老观念对互助养老的心理抵触。

4.1. 激活乡土文化基因，重建互助养老的精神内核

将孝亲敬老转化为村规民约的操作条山西长子县西马村提供了重要参照。该村在实践中将村规民约与积分制深度融合围绕孝老敬亲、邻里互助等核心领域，从而制定出十条可量化、可执行的村规民约，包含了22项加分项、19项减分项和4项“一票否决”条款。可以借鉴这一模式，这一模式将支持父母参与互助养老、邻里互助服务记录等纳入村规民约的考评体系。例如，子女主动为父母报名参加村内互助养老组织的，给予家庭积分奖励。低龄健康老人参与邻里互助服务的服务时长可以折算为家庭积分，凡有虐待老人行为、阻挠父母参与社会活动的家庭，直接取消文明家庭、星级农户评选资格。这种条款设计将抽象的孝道伦理转化为村民易懂易行的日常规范，从而使得互助养老更容易推行。

设立“孝行评议员”制度。浙江东阳葛宅村的创新探索极具启发性。该村推出孝敬积分制，同时成立了由村中德高望重长者担任的孝行评议员队伍，每月收集村民孝行并量化打分，并及时制止调解家庭中的不和谐行为。评议员不仅是打分者，更是榜样示范者，他们自身就是孝敬老、服务村民的标杆。有村民感慨：“村干部是把全村老人当成自家老人来孝敬，有他们带头，我们做子女的怎么好意思落后？”这种“榜样带头 + 公开评议”的机制，将抽象的“面子”转化为具体的公共评价压力。建议农村互助养老推广中，由村老年协会牵头组建“孝亲敬老评议团”，定期入户走访，对子女赡养情况、老年人参与互助情况、邻里互助表现等进行公开评议。评议结果在村务公开栏、村微信群、乡村大喇叭中公示，让“谁家子女孝、谁家老人福、谁家邻里亲”成为村庄公共话题。对表现突出的家庭，在传统节日

举行隆重表彰仪式，由村中长者亲自授牌；对消极应付的，则由评议员上门“喝茶谈心”。这种嵌入熟人社会的监督机制，比任何行政命令都更具约束力[9]。

4.2. 立足乡土，通过表彰将互助养老升华为村庄集体荣誉

如肥乡区在推广互助幸福院的过程中，将养老服务与文化活动深度融合。各村幸福食堂不仅提供助餐服务，还开展听戏、下棋等活动，在餐后，老人们聚在一起，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更重要的是，同时肥乡区将互助养老纳入评选体系之中，同时使得参与互助的老人和提供服务的志愿者成为村庄明星，还在重阳节、春节等传统节日举办邻里互助节，邀请受助的老人为志愿者颁奖，也邀请在外子女为邻里颁发感谢信，让互助行为在仪式中获得集体的认可[10]。这种仪式将这种互助光荣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荣誉，这一效果实际上远超宣传动员。

综上所述，提升农村互助养老认同度的关键，不在于空洞的“加强宣传”，而在于通过村规民约的条款设计、积分制的量化管理、评议员的日常监督、仪式化的集体表彰，将乡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工具。当“孝老敬亲”成为可计量、可比较、可兑换的公共行为，当“参与互助”成为赢得“面子”和实际利益的双赢选择，乡土文化便能从制约因素转变为推动互助养老的深层动力。

5. 结论

不得不承认，乡土文化对于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认同度具有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一方面熟人社会的特征降低了互助养老的信任成本，守望相助的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和互助养老模式的核心逻辑高度契合。我国孝亲敬老的伦理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社会认同，为认同度的提高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根基。但同时由于养儿防老观念的路径依赖，社会的变迁，引发的社会信任弱化、代际文化认知差异以及部分地区利己倾向的凸显，也不利于老年人对于互助养老模式的认知和接纳。

当前，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认同度整体偏低，区域差异明显，认知偏差突出，存在核心困境集中在文化传承断裂导致互助精神弱化、模式设计与乡土文化适配性不足、政策宣传与文化引导脱节、乡土信任体系瓦解后的替代机制缺失四个方面。因而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认同度，需立足乡土文化特点，从文化传承创新、模式适配优化、政策协同保障、人才培育支撑四个维度构建破解路径，并且通过挖掘乡土互助元素、在文化方面筑牢根基，并且通过构建熟人主导组织、优化服务内容增强模式适配性，加强文化宣传、完善激励与监管机制破解政策瓶颈，最后培养本土化带头人、开展技能培训强化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 [1] 陈英姿, 周倩. 东北地区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J]. 学习与探索, 2024(12): 103-110.
- [2]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 [3] 陆璐.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海南省为例[J]. 现代农村科技, 2025(1): 3-6.
- [4] 仇云东. 县域养老服务体系现状与优化路径探索——以云南省嵩明县为例[J]. 新丝路, 2025(8): 67-69.
- [5] 韩磊娟, 欧阳伟. 日本社区综合照护体系运行实践及启示[J]. 日本问题研究, 2025, 39(6): 33-48.
- [6] 魏蒙, 杜鹏.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互助养老的发展现状、问题与展望[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7(5): 112-118.
- [7] 刘丰伟, 王凤华. 空心化背景下推动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优化路径[J]. 农业经济, 2024(5): 89-92.
- [8] 张欣.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创新路径探析[J]. 行政与法, 2025(4): 106-115.
- [9] 赵浩华. 嵌入性理论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困境与破解[J]. 当代经济研究, 2024(2): 94-104.
- [10] 蔡淑琴. 老龄化视域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研究[J]. 农业经济, 2025(12): 92-95.